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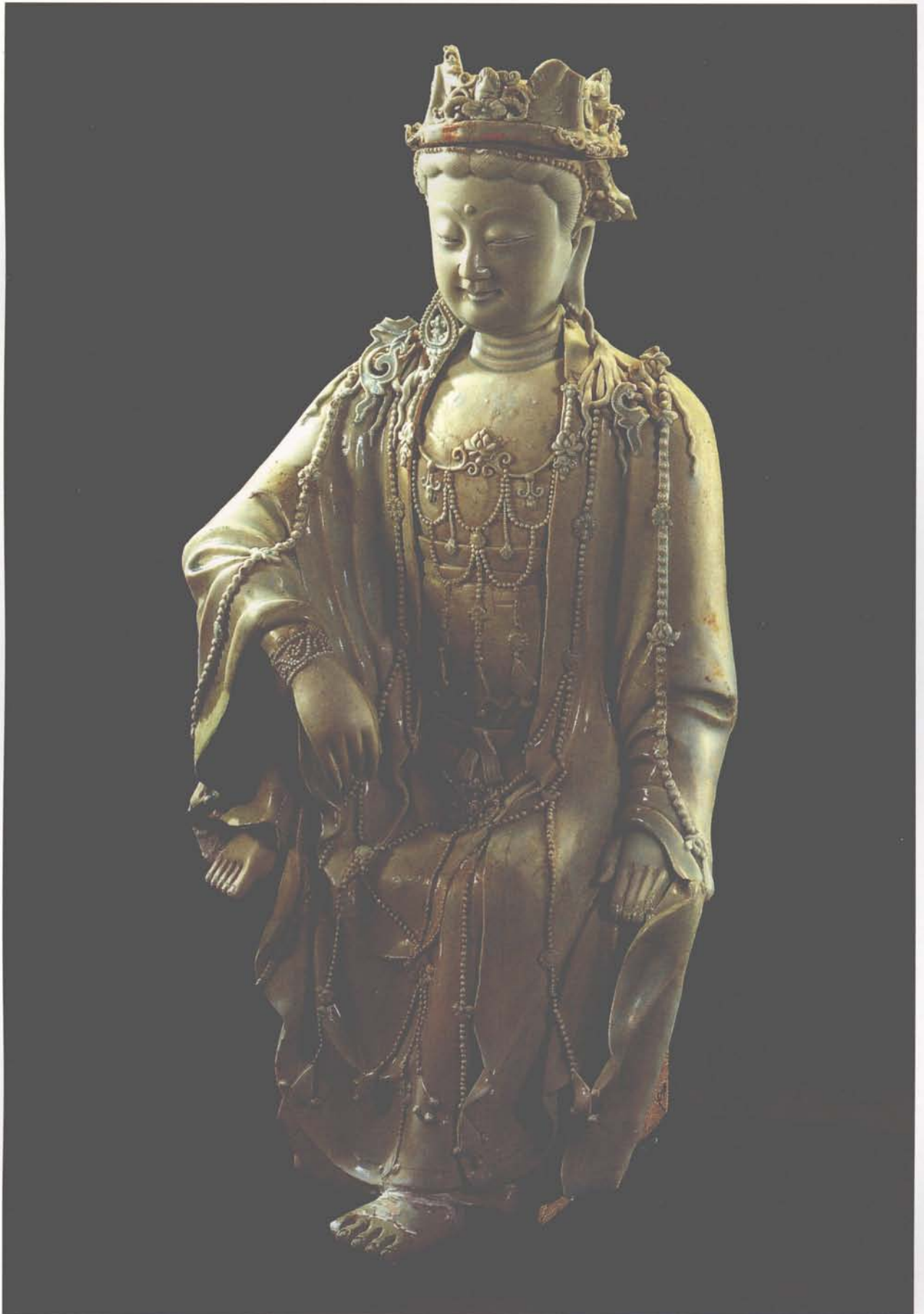
考古中国

韩欣 主编

下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目录

第一编 远古文明

(史前遗存探秘)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人类的初始社会 2

华夏文明的起源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14

人猿相揖别

——中国远古人类化石序列 20

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元谋人 23

亚洲北部发现的最早直立人化石

——蓝田人 25

人类在东方大陆的起源

——北京人、山顶洞人 29

亚洲原始类型早期智人的代表

——岭南马坝人 44

中国境内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

——丁村遗址 48

规模最大的母系氏族村落遗址

——半坡遗址 54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大地湾遗址 61

灾难遗存的真实再现

——齐家文化遗址 66

中国原始第一村

——大汶口遗址 76

史前“无字天书”

——河姆渡遗址 82

东方文明之光

——良渚文化遗址群 98

“万国林立”的首邦时代

——龙山文化遗址群 113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

——红山文化遗址 124

中原最古老的文明

——新郑裴李岗遗址 134

史前彩陶艺术的顶峰

——马家窑遗址 142

揭开藏文化源头之谜

——卡若遗址 153

淮河上游远古的辉煌

——贾湖遗址 161

中国最典型的史前文化

——仰韶遗址 169

目 录



目录



揭开七千年前祖先生活情景

——跨湖桥遗址 179

中国第一座内外城结构的史前城址

——藤花落城址 184

华夏第一村

——兴隆洼聚落遗址 188

第二编 王者降临

(先秦及秦汉遗存探秘)

中国最早的帝王之都

——二里头遗址 198

商朝第一座都城

——偃师商城遗址 217

商都掠影

——郑州商城遗址 224

“武汉之根”

——盘龙城商代遗址 230

近代中国最大考古发现

——安阳殷墟遗址 236

中国长江中下游青铜王国

——新干大墓 259



世界第九大奇迹

——广汉三星堆遗址 266

北京城的发祥地

——琉璃河遗址 277

城市总体布局的范本

——丰镐遗址与墓地 283

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晋侯墓地 289

古乐缥缈地深处

——曾侯乙墓 297

战国奇葩

——平山中山王陵 314

古蜀国考古重大发现

——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 332

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337

“铜奔马”的故乡

——雷台汉墓 369

奢华的天下第一崖墓

——满城汉墓 378

西汉孤魂

——马王堆汉墓 385

岭南考古第一发现

——西汉南越王墓 410



目录



目 录

“斗成”探幽

——汉长安城遗址 427

第三编 盛世传奇

(魏晋至明清遗存探秘)

揭开精绝国的神秘面纱

——尼雅遗址 434

走近尘封的记忆

——高句丽遗存 446

东方庞贝城

——楼兰遗址 460

世界艺术明珠

——莫高窟遗址 470

另一番冥幽世界

——阿斯塔那墓葬群 492

揭开丝绸之路起点之谜

——隋唐洛阳城遗址 504

花舞大唐春

——何家村遗宝精粹 509

佛指真身

——扶风法门寺 519



目 录



生命禁区中的奇迹

——札达古格王朝故城 536

“江南地下宫殿”

——南唐二陵 552

追寻远逝的民族

——辽陈国公主墓 555

东方金字塔

——西夏王陵 561

瓷器明珠

——南宋官窑遗址 575

十三世纪世界最大的都市

——元大都遗址 580

神秘的地下宫殿

——明代定陵 587

别有深意的“妇人启门”画面

——白沙宋墓 615

第四编 专题研究

(服饰与文字的考古证明)

云想衣裳花想容

——传统服饰的考古证明 620

早期汉字的考古证明

——说文解字 683

另一番冥幽世界

阿斯塔那墓葬群

(公元3世纪中叶~公元8世纪末)



地理位置: 西晋至唐代贵族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

发掘年代: 1959年至今

遗址内涵: 阿斯塔那古墓群，距吐鲁番市约40多公里。它是古代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2公里。墓葬按家族种姓分区埋葬，以天然砾石为界，畛域分明。阿斯塔那墓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古墓平面形状如“甲”字。墓室前方，是一条10多米的长的斜坡墓道，墓道尽头连着墓室，是死者安息的地方，墓室一般高为2米以上，4米见方大小，墓室顶为平顶或穹窿形。死者多安放在洞室后部的土炕或简易木床上，他们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眼上盖瞑目，双手握木，身着棉麻或绢锦织品制作的衣服。死者四周，或陈放模拟的亭台楼阁、车马仪仗、琴棋笔墨，或陈放葡萄、瓜果、饺子、面饼等食品，供死者阴间驱使或享用。

发掘意义: 为研究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经济、文化、民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492

阿斯塔那墓葬群遗址

从高昌故城东北一直延伸到西北，在10平方公里的狭长戈壁旷野上，是一片古代墓葬。

这里埋葬的墓主人，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元代约1000年间，曾经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活生生的高昌人。

在这高昌人无数亡灵的冥府中，有一个与人世凡界(阳间)并列的另一个世界天界(阴间)。这些墓主人认为阴间是阳间的翻版和延续，所以期望在死后仍然能得到同样的享受。

为此，人们要为死者陪葬各类象征享乐、富有、权力的物品。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娱乐，从金银珠宝到账目地契，从闺秀描红到盔甲兵戈，从世俗文字，到经书典籍，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人们称它是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

阿斯塔那(是突厥语“京都”或“首府”的意思)墓葬群所在地名叫阿斯塔那村(汉名叫三堡)，它与东北方向不远的哈拉和卓古墓群(即二堡)相联结。因此也称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

阿斯塔那墓地四周，在灰色的沙滩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沟槽和堆积的黄色土丘，这是考古工作者勘察挖掘后留下的痕迹。



绢花

参观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一些打开的墓穴。首先进入的墓穴是一个双人合葬的坟墓，里面漆黑一团，借助手电的光一照，两具仰面而卧的干尸赫然在目。

正中一土炕，炕上铺着芦席，上面干尸一男一女，是夫妻合葬墓。高昌历来与汉文化相通，盛行夫妻合葬或家庭成员数人合葬(在别的墓中出现土炕上有尸体，地下也依次排列尸体的情况。这应为家庭合葬墓)。

眼前这对夫妇肌肉已经萎缩，皮肤呈焦褐色，紧紧包在骨骼上。吐鲁番特有的炎热干燥气候成全了他们，使尸体脱水而不腐烂，留下了完整的干尸。死者赤身裸体，衣服和随葬物早已不存，腰间系着一条白布，很可能是考古者或守墓人所为。

男尸五官下陷，下巴脱落，张着大嘴，全身都像是在抽动，看来死者当时很痛苦，或者处在愤怒中，至今还留下愁眉苦脸和全力挣扎的形象。

女尸则不同，给人的印象平和多了，她的表情冷静、含蓄，像是在熟睡中被死神夺去了生命，使她留下极不情愿离开人世又万般无奈的表情。

还有一座是著名高昌大将军张雄夫妇的合葬墓。这对干尸已移至新疆博物馆展出。

另有两个墓室可供参观，其中一个墓室墙壁上绘有色彩鲜艳的花鸟图，花鸟图上面的云彩之间，还画了一些南归的大雁，为6幅屏风式花鸟画构成的组画。唐代中原花鸟画很发达，但只见记载难觅真迹。眼前这6幅唐墓中的花鸟画，仿照中原流行的6面屏风式样，无大的突破，但却是唐代花鸟画的真迹，亦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一组独立的花鸟画珍品。

另一个墓穴里有两具干尸躺在木板床上。据说当时只发现一具男尸，躺在一张破芦席上，没有任何随葬品，文物工作者为他架起木床，又从别处的墓穴中移了一具女尸过来。考古工作者经过鉴定，他不属蒙古人种，可能是中亚一带远道而来的外族人，在贫困孤独中客死异乡。

后来，这两具干尸被罩进玻璃罩子里。据说，这玻璃罩是一位香港人捐资制作的。墓室里有了电灯，可以清楚地看到，于尸塌陷的头颅上，那蓬蓬松松绾着的发髻完整无损，手指和脚趾上的指甲仍有光泽，使僵硬干枯的古尸传递出曾经活跃过的生命气息。

至今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考察了巨大墓葬群中的500多座坟墓，墓穴中的许多干尸和大量文物，经过清理后送到吐鲁番博物馆和新疆博物馆保存并展出。有的还飘洋过海远行异邦，到外国展览过。

这庞大墓葬群的发现，是延续千年的高昌社会生活的再现，是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除了各时期、各种类、各民族、各阶层墓主的数量浩繁的文物之外，特别重要的是这里还出土了数以万件计的文书。它们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被编印成一本又一本大部头

彩绘木雕踏鬼天王





唐代妇女工作泥俑



资料书和研究成果，用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出版，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新学科——吐鲁番学。

此外，还有丝、毛、绵、麻织品，这是历史文明的象征，也是东西方文明在吐鲁番盆地汇聚的实证。出土的丝织品有锦、绮、绢、纱、绫罗、刺绣等，色彩鲜艳，图案新颖，其中大部来自中原。锦袍、锦被上有青底绛红花纹和图案，由四神、如意、树叶、文吏头像组成的画面，放射出神秘之光。锦纹图案中的对兽对鸟、联珠鹿纹是中原常用的题材，而那些用纬线显花的孔雀、异鸟则是中亚、西亚流行的一些图案。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出土的丝织品还有西域出产的“疏勒锦”、“龟兹锦”、“高昌所作龟兹锦”，标志着晋至唐代，西域已经有了本地的丝绸纺织业了。出土的木制品有木案、木牛、木马、木猪、木鸭、木牛车、木俑、代人木牌，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陶器中的碗、盆、杯、罐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制作精细，已达到与中原陶器同步的技术水平；陶器图案多为佛教崇尚的莲花纹，说明佛教在高昌已非常盛行。而那些

纸鞋、纸帽和纸扎人形的四肢，似乎也暗藏着许多历史的奥秘。

在阿斯塔那墓穴中，除许多壁画外，还出土了大量纸画、绢画、麻布画、木版画作品，其中不少墓穴顶上钉着华夏始祖“伏羲女娲图”，最富文化内涵，倍受世人关注。出土的泥塑俑、木雕俑，特别是那些载歌载舞百戏俑，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展示了高昌社会崇尚艺术和演出活动频繁的兴盛局面，为今天的人们再现了西域和吐鲁番盆地舞台表演艺术多姿多彩的生动景象。

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钱币不仅有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还有本地流通的高昌吉利钱，以及相当数量的波斯银币和罗马金币。这对昔日丝绸之路经济发达和中外贸易繁荣的状况，是一个最好的实证。

在阿斯塔那墓葬中，殉葬品有实物，也有仿制、缩小、代用的象征性物品，古人以写实的写意、具象和抽象交替的形式，编制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营造了一个与高昌社会生活相对应的幽冥世界。

阿斯塔那墓葬，巧妙而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人类的本质。凡是墓主人生前拥有的，他们内心曾经有过的渴望和梦想，



在这里都获得了表现，获得了满足。

衣、食、住、行，游玩娱乐，在墓穴中样样不缺，从亭台楼阁到车马、绸缎，从琴棋书画到五谷、果品，葡萄瓜果种类繁多，糖果、点心、水饺、银铤、面饼、粽子样样俱全，呈现出高昌社会生活的一道风景和真实面貌。当然，任何时代都有贫富之分，墓穴中的这种社会差别体现得也十分明显。有大富大贵铺金盖银者，也有一贫如洗、一张苇席打发一生者。阿斯塔那墓穴中的景观，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某个时期、某些阶层的局部，也通过那林林总总的文书、堆积如山的文物，让我们看到吐鲁番地区千年万象和社会生活的全貌。

20世纪初，西方列强纷纷到这里大肆盗掘古墓，使得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解放后，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我国考古工作者从1959年开始，对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进行了14次大规模的挖掘和清理工作，共挖掘和清理墓葬467座，其

中有330座墓葬可以确定年代。古墓出土文物当中最早有纪年文字资料的是西晋泰始的九年（273）的木简。最晚的是唐建中三年（782）的北庭副都护高耀迁葬于此的墓志，前后历时五百多年。

20世纪初，在这遥远而荒凉的阿斯塔那墓地，忽然出现了许多外国人，有俄、德、日、英等国的探险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

斯坦因曾于1907年和1914年两次来到吐鲁番，在1914年11月至1915年2月那个暖洋洋的冬季里，斯坦因对交河、高昌两座古城和吐峪沟、柏孜克里克两处佛寺进行发掘考察。

1915年1月，他和他的探险队的工作目标就全部集中到阿斯塔那古墓群了。

吐鲁番盆地早已令斯坦因神往，那里的历史是那么富有神秘色彩，而那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虽然他知道，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早于他发掘过吐鲁番的文物，而且“所获特别丰富”，他还是步其后尘来到了吐鲁番。

阿斯塔那墓和其他遗址一样，都曾被德国人发掘过，但斯坦因发现戈壁滩上墓葬数量众多，“有很大的余地进行全面搜寻”。他把阿斯塔那古墓群划分为10个墓区，前后搜寻了34座墓穴。他满怀信心地说：“若在这里进行有计划的发掘，是会有更为可观的发现的。”

他在《亚洲腹地》和《西域考古记》中，详细记载了在阿斯塔那古墓穴的发掘情况。

斯坦因在当地雇了些民工，几十座墓葬很快被打开。他进入死者的居室，千年前的实物实景奇迹般地呈现在他面前。那一具具保存完好、形态各异的古尸，有的用毡或丝绸包裹，有的身穿各种服装，也有的赤身裸体。斯坦因说，古尸和随葬品数量多得惊人，是由于该地干旱无雨，也由于源自中国的习惯，即用死者珍爱的东西殉葬；或以埃及方式，将物品缩小为仿制品陪葬。他发现，所有的尸体已“木乃伊化”，缠裹尸体的丝绸是中国的，但“也有许多



云头锦鞋



侍马图

属于波斯风格”的锦缎、刺绣，其中拜占庭式图案可能是为了适应西方市场而设计的。有些印染的丝绸上，绘着死者的肖像。

“大量泥塑，有哭丧者，有守护神，有披着华丽马衣的马匹等等，全都惟妙惟肖”。斯坦因看到，每一座墓室中都陈设着几具尸体：一对夫妻或一夫二妇。尸体一般都置于一个土台上，当人们挖掘坟墓时就为死者留下一个安息的土台，也有的尸体躺在木板搭成的尸床上，还有将尸体殓入木棺的，但这类木棺很简单，且许多木棺已不存，被盗墓者搬去当柴烧了。许多遗体还非常完整，斯坦因说这些死者是按照“他临死时的姿态”而埋葬的。他发现一些死者口里的钱币，有中国钱币和萨珊王朝时代的银币，还发现一些非常罕见的金币。他说这些金币是对

拜占庭铸币的非常粗糙的仿造品，还“分辨出其中的一枚金币是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的勋章”。某些死者手执一截木棍，或将木棍放在臂下或腋下，像是金钢杆似的器具。他特别注意到在死者身下的陈尸布两旁上部绘有图形，似乎想用这图形表现死者的面庞，这些图形是用黑色线条草绘的。死者穿着当时流行的衣衫、鞋和帽是用涂成黑色的纸做成的。有时发现死者胸部放着一些用纸剪的微型衣服，作为供奉物。还有各色的“废纸”，显然是用来塞垫棺材的。正是这些殉葬物中的各种“字纸”，成为斯坦因发现的宝贵文书的一部分。

墓葬中普遍供有各类食品，这些食品放在死者头前，有的还将食物放在小平台上或低矮的小炕桌上，斯坦因说“这完全如同平常人们用餐一样”。在一个细口大肚的陶罐里，盛放着殉葬的蜂蜜。有些钵和碗中，存留着葡萄、李子、黑豆和肉类。除了供奉面食，有些墓室中还陈列着用泥土制成的象征性食物。有圆条状的，“有8字形的松饼”，有麻花状的和花朵状的食物和一个分成四份的饼。这些食物造型有的使用了模具，斯坦因就发现了类似的制造食物或象征性食物的模型。

尽管阿斯塔那墓在斯坦因进入前，已遭到盗墓人的浩劫，但斯坦因还是发现了有价值的物品和首饰。如涂了彩漆或编织得非常精巧的盒子，其中存着女人的化妆品：梳子、发夹、胭脂盒。斯坦因在许多墓的入口处还发现砖形墓志，上面记载着死者的姓名、生卒时间，有的还记述其官号及居官仕途的各阶段情况。在女性墓志上，往往还有赞扬她持家方面的才能及其他美德的文字。

但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斯坦因在墓穴中发现的艺术品。一座墓室的墙壁上，画着由几头牛和一头骆驼拉的车，另一座墓室墙壁上画的是一个男子、一个女子、一头骆驼和一辆车，还有一座墓室的装饰画也大致相似，一男子坐地毯上，周围坐着一些仆人。最使斯坦因惊喜的是，他在一些墓室顶上发现了绢质的“伏羲女娲图”。还有几幅残破的但艺术性很高的绢画仕女图，画的是一些在花园中游乐的美丽的妇女。另外两幅纸画，一幅“饮宴图”，一幅“乐舞图”，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斯坦因认为，“中国美术到唐代号称极盛，这些绘画虽是残片，然而不失其为世间绘画的一个范本。尽管破碎，还是有很大的价值”。

在古墓黑穴中，斯坦因忘情地流连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中，但当他看到古人干尸脸上覆盖着带有花枝图案的丝绸物时，一股神秘气息向他袭来，使他感到茫然。他很快发现这种现象在各墓穴中普遍存在，于是

他就用“覆面”这一称呼来为盖在死者脸上的这种圆形的丝织物命名。它一般用锦缎裁成或用小块丝绸缝缀在一起,大部分都有大型珠饰和圆形画像图案,这些画像有野猪头、长翅膀的千里马、怒目而视的狮子和骑马射箭的骑士。

除了“覆面”,还有金属“眼罩”,这些“眼罩”固定在一块织物上,一般都没有打洞,仅仅是放在死者眼上的装饰,银质“眼罩”较多,也有用薄片制作的。

“覆面”与缝在织物上的金属“眼罩”连接在一起盖在死者脸上,这就使我们想起玄奘法师离开高昌时麹文泰送他的“面衣”,即“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的一段文献记载中提到的“面衣”。

虽然斯坦因只把“覆面”、“眼罩”作为一种葬俗来记载,而我们却不得不把这种葬俗,与西域严寒刺肤、风沙扑面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这是人们希望为死者继续防风御寒的一种美好心愿。

斯坦因从古墓地穴中爬出来,已是吐鲁番艳阳高照的二月天气。他将古墓中和吐鲁番其他地方如高昌、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等处收集的文物打点了一下,共141箱,用45匹载重的骆驼,由他的心腹助手伊卜拉欣伯克带领,通过喀什噶尔,运往印度去了。

斯坦因从吐鲁番运走的文物,有文书、古籍、艺术品以及丝绸、陶瓷制品等等。后来,这些文物又运往伦敦,收藏在伦敦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中。有关吐鲁番文物的发掘报告,斯坦因在他的多卷本《亚洲腹地》中刊布。

斯坦因的这些著作,是我们深入了解阿斯塔那墓葬的重要补充资料。

阿斯塔那古墓群区盛行家族墓葬,体现了封建的宗法关系。墓葬地表全部以砾石堆砌为界,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坟院”。平面呈“甲”字形,依据辈份不同,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古墓内墓道与墓室的顶部,地面也用砾石堆起。墓葬形制基本是有两种:一种是斜坡墓道洞室墓,这是大型墓,一般为夫妻合葬墓,也有一男二女或三女的墓;另一种是长方形的竖穴墓道偏室墓,这是小型墓,一般墓为单人墓。阿斯塔那墓地,是高昌的地下博物馆,是高昌的历史档案库,迄今为止,阿斯塔那古墓群已经出土了各种文物一万余件,其中有各种古代文书、私人信札、契约、账籍、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墓志、丝、棉、麻、毛织物、壁画、绢画、纸画、

伏羲、女娲绢画



泥俑、木俑、木器、农作物、瓜果食品这些文物极其珍贵,有的是罕见的艺术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这些文物是研究西域历史的珍贵资料,对研究晋唐时期吐鲁番和整个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近几年,和举世瞩目的敦煌学并称,出现了一门新的显学,吐鲁番学,还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学会,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各种文物。随着新的墓葬发掘,新出土的文物将会继续增加,每一座古墓

都可能是一个“藏经洞”，所以说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地下历史博物馆”。

阿斯塔那古墓群占地 10 平方公里，唐朝时称西北墓区为“西北旧墓”，北面称北原，东北墓区称为“北陵”。北陵可能是高昌王室的墓区，这里墓室讲究，殉葬品规格较高，死者是一些高级官吏。平民的墓室简陋窄小，尸体用破毡柴草裹盖入葬。这里说明一下，干尸与木乃伊不是一个概念。闻名世界的埃及木乃伊，是经过人工处理，尸体内放入防腐剂、香料等物质，而吐鲁番干尸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处理，人去世后直接埋入地下，尸体迅速脱水变为干尸。由于吐鲁番气候干燥，地下水位低，一般深达 20 米以下，而墓室一般最深只挖至 5 米，所以这一段地层异常干燥，产生了一种天然无菌环境，尸体不会腐烂。因此墓内许多怕潮湿的千年遗物都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干尸是研究历史上新疆居民的种族，民族特征以及其融合过程的珍贵人体标本。

贵族墓室内有一左一右两个洞穴，称作“耳室”，是用来放置大型陪葬品的。正前方环形的台子是停放尸体的，两侧摆放小型的陪葬品。死者一般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双手握木。墓室大多有一砖制墓志，记载死者姓名、籍贯、年龄、身份及颂词。死者大多数直接停放在苇席上，墓室顶部钉有“伏羲女娲”图，有的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伏羲女娲”是华夏子孙传说中的始祖，人首蛇身，相互交合，伏羲左手持“矩”，女娲右手持“规”，上有日，下有月，四周缀有星辰，他们共同开天辟地，创造世界，在墓室放置“伏羲女娲图”是中原地区的一种丧葬习俗，在汉代非常流行，有祈求灵魂升天，人丁兴旺的意思。由于汉代开始大量汉人移民戍边，这种习俗传到了西域，在吐鲁番，一直到唐代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大概也有借以表明族源的意思。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与分期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皆为土洞墓，有的墓绘有壁画。墓主大多是居于此地的汉人，少数为汉化的兄弟民族。随葬品主要有陶（泥）、木质的俑和器皿、绢画、墓志及装饰品。同河西以至中原墓葬有不少相同之处。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可将其分作 3 期：第一期，晋至十六国时期（3~6 世纪初）。墓葬形制有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竖井墓道土洞墓两种。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作四角攒尖式或覆斗式。普遍以木棺为葬具，也有使用梯架式葬具或仅以破毡、柴草裹尸者，有的则直接陈尸于席上。以木俑及火候高、质地硬的灰陶器皿为主要随葬品，陶器多素面。墓志甚少见。壁画以描写地主庄园生活为内容，绘画风格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近。第二期，为高昌时期（6 世纪初~7 世纪中）。竖井墓道土洞墓消失，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的墓

道加长，墓室四壁向外作弧形凸出，顶部渐趋平圆。以木棺为葬具者数量锐减。随葬木俑减少但制作稍精，随葬器皿趋于明器化，灰陶器逐渐被专门用以随葬的彩绘陶器所代替。这种陶器体小质劣，器表涂黑，每以红白绿三色绘出点、线

树下美人图



彩绘木雕骑马武士俑



组成的仰覆莲纹。墓内出现大幅伏羲女娲画像。砖质墓志流行，也有用土坯、片石、木板为之者。从此期开始于地面建造家族坟院。坟院内的墓葬大体依死者辈分及长幼排列，体现了封建的宗法关系。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期~8世纪中期)。墓葬形制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墓道更长，墓室规模更大，四壁向外弧出更甚。一些大墓墓室前增置甬道，且有在甬道两侧凿壁龛者。还出现了带天井的前后室墓及刀形墓，仍有用木板或梯架式葬具者，陈尸于席上是最常见的葬法。随葬品中，陶俑数量显著增多，其类别与中原地区唐墓略同。陶器以素面为主，一般烧成温度较低。彩绘陶器纹饰简化。陶俑和多数晚期陶器不加烘烤。墓内出现伏羲女娲的绢画。还出现一些形制较大、文字较长的石质墓志。长安年间(701~704)以后的墓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优裕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间较早的以人物为主题，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

随葬品中的重要文物

随葬品中重要文物有各种织品、

文书、少数民族文字木牌和雕塑及手工艺品。出土的大量晋至唐的丝、棉、麻、毛织物中，尤以丝织品最丰富，锦、绮、绫、绢、缣、纱、罗、轻容、刺绣、染缬，无所不有。

东晋、北朝时期，工艺最复杂的织锦，主要品种仍是汉以来的平纹经锦，其花纹布局，虽沿袭汉锦花纹成行排列的传统，然其纹样已采用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等。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斜纹组织纬线起花新工艺织成的纬锦，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兽头纹锦，也是波斯风格纹样的纬锦标本。唐代的丝织品，无论出土数量、花色品种、工艺技术都在东晋、北朝之上。出土实物表明，早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及新出现的纬锦即已得到长足发展，平纹经锦的精品，如联珠对马纹锦，达到了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程度；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产量倍增。联珠禽兽纹纬锦的出土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这意味着它既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又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唐代中期，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像

彩条斜纹经锦那样的人字纹织物和晕提花锦，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品种。在一座垂拱年间(685~688)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特殊的丝织品，一为双面锦，一为缣丝，都是同类织物的最早实物标本。

染缬是一种靠染色显花的织物，在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西凉墓出土的纹缬绢，红色地上显一行行白色菱形花纹，北朝墓出土的蜡缬绢，蓝色地上装点白色圆点，都是丝织品染缬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染缬，一般认为仍是绞缬、蜡缬两种。永淳二年(684)墓出土的纹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然后施染，现出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是唐代绞缬中的精品。唐中期墓所出双丝黄地对鸟花束蜡缬纱、单色绿地狩猎纹蜡缬纱、绛地花云纹蜡缬绢等，图案工致，浸染均匀，均是唐代蜡缬中的精品。唐墓中还发现了两色蜡缬绢。其中一件土黄地上显黄、白两种花；另一件为茶褐色地上显绿、白两色花。对这些染缬标本的制作工艺，学术界尚有争